

中国河北

邢台 元金 石志

周和年题

冀金剛
赵福寿
主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邢台开元寺金石志

冀金剛 趙福壽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邢台开元寺金石志 / 冀金刚, 赵福寿主编. --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013-5168-8

I. ①邢… II. ①冀…②赵… III. ①金石—拓片—邢台市—图集
IV. ①K87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1003 号

书名 邢台开元寺金石志
著者 冀金刚 赵福寿 主编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毫米 1/16

印张 30.5

字数 450 千字

印数 1—4000 册

版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13-5168-8

定价 680.00 元

《邢台开元寺金石志》编委会

顾 问：周和平

净慧长老 明 海

主 任：王素平

执行主任：胡朝元

副 主 任：赵坤峨 明 憨 道 智

闫士杰 郝京茂 杨清波

主 编：冀金刚 赵福寿

编 辑：王 霖 王 静 白全忠

李兰珂 赵 云 赵献堂

序

邢台依山凭险,地腴民丰,乃先商之源、祖乙之都,至今已有 3500 多年的建城史。邢台开元寺作为中国创建最早的寺院之一,其历史可追溯至后赵襄国中寺甚至更早。自那时起,此寺历经 1700 多年的历史积淀,遗存了相当丰富的金石文物。冀金刚、赵福寿二先生主编《邢台开元寺金石志》,首次集此寺魏晋至民国间之金石遗珍,详加考察辨析,注征发微,公诸于世,不仅对全面了解、研究、开发、利用邢台的历史文化资源大有裨益,而且对全面了解、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尤其对全面了解、研究中国佛教发展史大有裨益。

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影响不仅及于政治、经济领域,更广泛融入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隋唐以后,佛教更与中国固有的儒学、道教相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广泛吸纳、融汇外来优秀文化成果,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才能历久弥新。

邢台西倚太行,东枕广原,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更是多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重要隘口。后赵时,西域高僧佛图澄在襄国中寺弘法传道,感化石勒;盛唐时,新罗高僧惠觉与其师神会在邢州开元寺两树六祖慧能碑;元朝时,忽必烈两幸邢州开元寺并全力支持广恩创立大开元宗,正是佛教及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中华文明注入新元素的历史证明。就此而言,邢台与邢台开元寺的历史,就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相互融合、团结与发展的历史。《邢台开元寺金石志》著录之碑刻、塔幢、造像等珍贵文物,正是这一历史的重要注脚。

自三代始,铭金勒石就是华夏先民传承文明的重要方式。《墨子·尚贤》等篇即有“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之语。欧阳修《集古录》自序称金石“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指出了金石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载体的文献学意义。朱剑新《金石学》则在论述“金石学之价值”时进一步明确“综其功用,可以证经典之同异,正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考文字之变迁”,且能辨文章之渊源、体制、工拙,详艺术之书画、雕刻。此外,中国古代石刻往往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不但与其产

生地的人物兴替、民风民俗紧密相连,且能折射出国家兴亡、都邑变迁的历史脉络。中国图书馆地方文献事业的开创者杜定友就说:“良以地方文献,非特为掌故史料之宝藏,抑且读之发人深省,使祖述先贤、爱护乡邦之念油然而生,其影响于一国之文化,至深且巨也。”换言之,地域性金石志可由一地之文化记载,及于一国之历史源流;《邢台开元寺金石志》的内容虽仅限于一寺之资料,串联起的却不仅是邢台开元寺的悠久历史,而是通过这一极具典型意义的个案,客观而又系统地反映出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史。

就材质而言,金石文物似可历时久远,但却易受水火、风雨、兵革之侵害,其自然情状与文字图案常须仰赖拓片和著录金石之书籍方可广泛传布。新世纪以来,国家加大了文物和古籍保护工作的力度,为金石铭文摹图留形之传拓技艺,也已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既使无形的传拓技艺与有形的金石文物得到了同样的保护与传承,也使金石文物及其拓本的整理与研究进入了新的繁荣期。《邢台开元寺金石志》在这一新时期文化政策引导下,首次把此寺的金石文物传拓、摄影、绘图,以编年的形式集中著录、注释、考证,公诸于世,以物证史,以史鉴今,为了解、研究中国佛教史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所以说,此书的编著不仅是一项相对系统的地方文化工程,也是对金石学这一传统学科的现代化运用,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卓有成效的保护与传承。

尤为感人的是,从立意著述,到付梓出版,《邢台开元寺金石志》还凝聚着邢台各级领导、各界人士之心血。当代禅门泰斗、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邢台大开元寺复建后的首任住持净慧长老往生之前,曾经多次顾问此书的编撰进展情况,并撰联“一代中兴古迹每怀泛爱寺,千秋法脉开山遥忆佛图澄”,以示关切;我的学兄、邢台市政协原副主席胡朝元,作为邢台大开元寺修复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不仅一直为邢台大开元寺的复建工作殚精竭虑,奔走操劳,并且主动担任本书编委会执行主任,为此书能够顺利编著、圆满出版出谋划策,协调各方关系;中共邢台市委统战部部长王素平,作为本书编委会主任,则在为解决本书出版资金的关键环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运筹作用。当然,邢台开元寺文物管理所所长冀金刚、邢台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赵福寿二先生作为本书主编而钩沉索古、苦心孤诣,更是功不可没。本人生于斯、长于斯,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在《邢台开元寺金石志》即将付梓之际,尊朝元兄等乡贤之命,奉为此序,向高僧大德、乡贤先进表示敬意,并希望更多有识之士为弘扬地方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而立功建业!

周和平

2013年8月

(作者为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

凡例

一、本书共辑入邢台开元寺、邢台开元寺塔林及与邢台开元寺密切相关的历代金石文物 129 件,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 4 件,隋唐五代时期 26 件,宋金元时期 55 件,明清时期 39 件,中华民国时期 5 件。时代最早之《汉故上党国王太夫人荐功碑》镌刻于西晋建兴元年至二年(313—314)间,最晚之《重修开元寺大雄殿并立碑落成典礼记》镌刻于中华民国三十三年(1944),时间跨度约 1630 年。

二、为尽量全面反映邢台开元寺历史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本书分“古刹青史”、“塔林遗珍”、“开元流泽”三部分进行编辑,并以金石文物形成之历史纪年先后顺序编次。凡无确切纪年可考者,则据其反映之历史信息断代后,编入其所属历史时期之末。

三、本书收入碑碣、经幢、塔铭、造像、钟铭及其他具有研究价值的金石文物,并以拓本、照片为主要形式辑入。其中,碑碣幢塔残石与全拓均存者,其残石拓片与全拓本一并辑入,以便相互对勘;原石与拓本均佚而其文见于文献著录者,则辑录其文,以便系统研究,原石与拓本均佚而有碑目见于文献著录者,则辑录其目,以便继续探索与发现。

四、本书文物名称,原则上采用原碑额题。原碑、幢无题或因残而额题不存者,则据其内容拟定;凡采录于相关文献著录之碑目,则仍其旧;凡造像及其他类文物,则据其历史时期及自身特征拟定名称。

五、为方便读者,每件文物名称之下均作“简要说明”,其拓片、照片之后附有录文点注或相关文献、初步考证。其中,录文点注均以现代通用格式和简化汉字排版,原件行文格式一般不予保存,但其以小字插行镌刻者保留原状;原件中之繁体字、俗体字、异体通假字、缺笔讳字凡可识别者,均改用现行标准简化字;个别不可识别者及专用人名、地名及改用现行标准汉字易引起歧义者,仍照原样录入;所附相关文献资料不予注释。

六、凡因原件残缺较多,录文时难以确定残缺字数者,均以……号表示;凡因原件剥泐、漫漶而能确定其字数者,均以□号表示;凡因原件剥泐、漫漶不清却可通过上下文确定其为何字者,则填入□内;一些残碑转行处以「表

示；凡经幢、塔幢所镌经文咒语，一律略而不录。

七、凡重要文物，除编录其全拓、全貌照片外，另附其局部特写或线描图，以便读者研究与欣赏。

八、本书所辑金石文物，均系目前所存所知者，远非邢台开元寺历代金石文物之全部。书中之《邢台开元寺金石文物概述》《邢台开元寺金石文献编年》，以及对一些人编金石文物的考证文章，均为编者根据目前所存所见相关金石文物作出之初步研究成果。

目录

序	(1)
凡例	(1)
邢台开元寺金石文物概述	(1)
一、古刹青史	
汉故上党国王太夫人荐功碑	(11)
汉白玉佛祖头像	(24)
北朝题记造像龕	(26)
北朝造像龕残件	(28)
隋文帝舍利塔碑	(30)
邢窑陶质佛教造像	(34)
开元二十一年陶质造像碑	(36)
六祖能禅师碑铭	(38)
曹溪能大师碑	(50)
十六面尊胜陀罗尼经幢	(56)
大唐广阳漆泉寺故觉禅师碑铭并序	(62)
尊胜陀罗尼与大悲咒合刊幢	(68)
工字形须弥座菩萨造像(一)	(74)
工字形须弥座菩萨造像(二)	(76)
唐须弥莲座弥勒坐像	(78)
线刻罗汉图	(80)
八面尊胜陀罗尼经幢	(82)
石雕经幢华盖(一)	(84)
石雕经幢华盖(二)	(86)
石雕经幢构件(一)	(88)
石雕经幢构件(二)	(89)

线刻经变故事图	(90)
大佛顶随求尊胜陀罗尼经之幢	(94)
八面尊胜陀罗尼经幢	(108)
钟离权草书题壁诗刻石	(110)
敕赐圆照塔记	(116)
大金邢州开元寺重修圆照塔记	(122)
大定甲辰铁钟铭	(128)
邢州开元寺礼请广恩疏	(132)
邢州开元寺资戒大会记	(134)
万安恩公碑铭	(136)
开元寺累降圣旨碑	(141)
顺德府大开元寺重建普门塔记铭	(142)
大元顺德府大开元寺资戒坛碑	(150)
大元元年残碑	(154)
顺德府大开元寺弘慈博化大士万安恩公碑记	(156)
普门宝塔壁龛之记	(162)
岐王施长明灯记碑	(166)
顺德府大开元寺万安座下历代住持并垂法名颂之碑	(170)
顺德路大开元寺护国仁王佛阁法堂之记	(172)
顺德路大开元寺钟楼记	(177)
常山王看转藏经记	(184)
开元寺累降圣旨碑	(189)
线刻罗汉图	(190)
云鼓门枕石	(192)
大雄宝殿雕龙石柱题记	(194)
开元寺药师佛殿柱础题记	(202)
重修开元寺殿阁记	(208)
王景施银敬造龙柱题记	(212)
开元寺铜佛记	(214)
重修开元寺菩萨殿记	(215)
续曹洞正宗法派记	(218)
重新金身碑记	(221)
开元寺石佛记碑	(223)
重修开元寺山门两殿记	(229)
新建群墙柏树碑记	(230)
开元寺第二十四代住持祖翱修建普门阁题记	(232)
香案施主题记	(234)
僧众题名残碑	(238)
邢台开元寺藏经印	(240)
重修古邢州开元寺碑记	(242)
重修顺德府开元寺残碑题名	(246)

重修钟楼碑记	(248)
重修开元寺毗卢千佛阁记	(250)
开元寺康熙二十一年公谕碑	(254)
重修地藏王菩萨殿布施碑	(258)
重修开元寺碑铭	(260)
重修开元寺碑记	(264)
开元寺钟楼悬钟石柱题记	(268)
重修开元寺毗卢殿记	(270)
开元寺僧众题名残碑	(274)
开元寺施主题名残碑	(276)
邢台开元寺瞻拜记	(278)
重修顺德开元寺碑记	(282)
开元寺悬大钟碑	(287)
重修开元寺因缘记	(289)
重修开元寺大雄殿并立碑落成典礼记	(292)

二、塔林遗珍

尊胜陀罗尼经残幢	(300)
石雕经幢华盖(一)	(302)
石雕经幢华盖(二)	(304)
石雕经幢构件	(305)
石雕经幢莲座	(306)
百泉瑀禅师塔	(308)
安慧大师之塔	(312)
圆融大师通悟大师塔	(316)
喜公庄主之塔	(318)
□山讲主□公之塔	(322)
通理大师都提点隐公塔	(326)
宗主慧明大师之塔	(330)
宣公讲主大和尚塔	(335)
弘范大师僧录会公之塔	(342)
顺德府莲净庵住持尼进宗主创置祖坟寿塔记	(344)
提点大士渭公之塔	(346)
瑄公庄主之塔	(350)
弘济大师之塔	(352)
欣公藏主之塔	(356)
正信弘教大师提点寿公之塔	(360)
岱公首座之塔	(362)
奘公禅师之塔	(366)
峇公禅士之塔	(369)
普化大师珞公之塔	(372)

欢公长老无尽寿塔	(374)
开元寺无名塔	(376)
开元寺妙□长老之塔	(378)
中山长无庄主妙和之塔	(380)
圆寂亲教师□修立禅师天乾公和尚觉灵之位碑	(382)
圆寂亲教师祖演空法公觉灵碑	(384)
西域轨范意旨单	(386)

三、开元流泽

磁州武安县定晋寺重修古定晋禅院千佛邑碑	(390)
襄州凤山延庆禅院传法惠广大师寿塔碑	(398)
德州齐河县刘宏镇报德慈恩院旬公和尚碑	(406)
涿州创建龙泉寺碑铭	(412)
大伾山大元帝师法旨之碑	(416)
大伾山天宁寺佛门宗派碑	(418)
大伾山天宁禅寺创建拜殿碑	(422)
管领大开元一宗诸路都宗摄损庵益公长老碑铭	(426)
大庆寿禅寺住持秋亭禅师亨公道行碑	(430)
金陵天禧寺佛光大师德公塔铭	(434)
灵岩寺第三十三代古岩就公禅师道行之碑	(438)
少林寺住持小山禅师行实碑铭	(442)
邢台开元寺金石文献编年	(447)
后记	(475)

邢台开元寺金石文物概述

邢台位于冀南平原,作为河北省地市级历史文化名城,向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醇厚著称于世。大量已经出土或已被发现的地下、地上文物与文献记载证明,邢台的历史文化与中华母体的历史文化血肉相连,密不可分。邢台从古至今得天独厚,一直都处于中华民族母体的腹心之地。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有多久,邢台的文明史就有多久。

在先秦时期,邢台这片热土以“邢”为名,曾是先商之源,祖乙之都,邢侯之国,赵襄子崛起之地。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至清王朝结束,“邢”之名数易,先后以信都、襄国、邢州、信德府、顺德府彪炳史册;邢台古城或作为后赵国都显赫于世,或以封国首邑、郡、州、路、府治所的显要地位,成为冀南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正因如此,邢台不但是中国历史上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而且成了中华各族乃至中外国际文化相互碰撞,进而相互交融的突破口。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是世界性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约于公元前后传入中国。佛教经过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播、演化与发展,不断吸收中华民族的精神营养,已经被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所包容,形成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但形成了精深的哲学思想、独特的精神财富,而且留下了丰富的经典文献、宝贵的文化遗产。邢台开元寺的金石文物,就是这些文化遗产中弥足珍贵的一部分。其中,碑记、塔铭、经幢、造像形式多样,无所不有,尽管有些已是断碑残石,只留下片言只语,冰山一角,涉及的内容却相当丰富,不仅可以补充中国佛教史的许多缺略,澄清中国佛教史的某些疑案,而且可为研究中国历代佛教文化的发展脉络,提供第一手资料。

这些金石文物雄辩地证明,邢台开元寺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仅是邢台历史最悠久的寺院,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寺院之一。佛教中国化的起步、转折与发展,以及中国佛教的学术化、艺术化、社会化,都可以在邢台开元寺的金石文物中找到反映。邢台开元寺的发展历史,堪称中国佛教发展史的浓缩版。

一

据信史记载,自两汉相交之际的公元前后到东汉末的二百多年,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期。当时,佛教还附庸于黄老之学,影响仅限于皇室贵族之间。从魏、吴、蜀三国鼎立,到西晋灭亡的近百年间,佛教在中国虽有所发展,却只是初露端倪的佛教义学与魏晋士族热衷的玄学相互影响,相得益彰;而游化于两京洛阳、长安乃至其他通衢大邑的西域僧人,仍被开创“正始之音”的嵇康之流蔑称为“乞胡”。因此,当佛图澄在后赵襄国弘法,被石勒尊为“大和上”,最终形成“中州胡晋,略皆信佛”,“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的空前局面,使其“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创建了第一个真正属于中国的僧团之后,佛教才迈出了其开始走向中国化的第一步。就此而言,佛图澄实为推动佛教在中国实现社会化,真正进入黄金发展期的第一人;襄国堪称佛教在中国生根、开花并结出首批硕果的第一中心城市;而襄国中寺,则是佛图澄在襄国乃至后赵弘法的第一所寺院。

据《晋书》与《高僧传》所载《佛图澄传》,永嘉六年(312)佛图澄随石勒到达襄国时,襄国城中已建有佛寺,而其“听铃音以言事,无不效验”,乃至以“五明”之术救龙出水,治病复生,观天象知休咎,预测行军吉凶,进而取得石勒崇信,被尊为“大和上”的驻锡之地,就是这西晋时已有的襄国之寺。石勒不但将诸稚子皆寄养于该寺中,每年四月初八亲到寺中灌佛,为诸子发愿,而且对佛图澄“有事必咨而后行”,命其直接参与外灭刘曜,内平叛乱,留守襄国等军政要务,且在为其创建大内宫寺,以便随时咨询的同时,为其扩建之初住之寺为襄国中寺,使其成了佛图澄在后赵弘法的中央之寺。关于这襄国中寺,此前仅见光绪版《邢台县志》记录“净土寺”时注曰:“旧志相传,寺为佛图澄遗迹。初无确证,阙疑可也。”因为“初无确证”,千百年来只能“阙疑”,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所幸者,由后赵开国第一功臣张宾之义从史兰等数十人于光初五年(322)所立《汉故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汉阳景侯张公之碑》,于20世纪末在邢台市桥西区中华路一带出土,首先为确定后赵襄国城址指明了方位,也使今人第一次在邢台市看到了石勒建都襄国的实证。2002年,由石勒的恩人郭敬,包括与石勒共结“十八骑”起事的吴豫、逯明、孔豚等数百人于西晋建兴元年(313年,或建兴二年即314年)为石勒之母王氏所立《汉故上党国王太夫人荐功碑》,又在平整邢台开元寺院落时,于药师佛殿前东南处出土,初步证实邢台开元寺的前身,乃是后赵襄国中寺。

作为至今仅见的中国佛教第一碑,《汉故上党国王太夫人荐功碑》出土时已呈莲座形,底面为碑阳,直径约0.75米,残存碑文17行;上面为碑阴,直径约0.93米,残存题名27行。碑阳、碑阴皆为隶书,虽然石质层层剥落,而字口仍清楚。碑阳界格分明,书体直追两汉,风神遒劲,潇洒峻爽;碑阴题名字体稍小,排列整齐森严,波磔稍收却不拘谨,颇具庙堂之气。当然,相对于中国佛教史而言,这通残碑的史料价值,远远超过其书法价值。

南北朝(420—589)既是中国佛教全面持续高涨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分裂割据期。这一时期的襄国,就先后处于北朝一系的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统治之下。这一时期的襄国佛教,也与南朝统治区的持续高涨截然不同,明显处于恢复,破坏,再恢复,再破坏这样一种艰难曲折的历史漩涡之中。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一是冉闵在后赵发动政变之际,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大仇杀,并将后赵襄国宫城彻底破坏,使佛教在襄国失去了已有的民众基础和政权支持,迫使佛图澄的弟子道安不得不率其僧团主力辗转逃亡,最终南下,前往东晋境内谋求发展。二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有两次就发生于襄国所在的北朝统治区。这两次法难的时间虽都很短,对于北朝佛教的打击却都是毁灭性的。襄国佛教亦难例外。

所以,今邢台开元寺虽建于后赵襄国中寺的废墟之上,但能证实其曾经过北朝恢复发展的金石文物,至今所见只有几件已残的石质造像。这些石质造像均于偶然间出土。其中,一件典型而精美的北朝汉白玉圆雕佛头,出土于今邢台开元寺外广场;两件已被砸残的北朝石质佛龕,出土于今邢台开元寺内。这些北朝佛教文物在今邢台开元寺区内的出土,恰可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顺德府知府周泰峙等所立开元寺《石佛记碑》所记“此石佛者,相传发之土中,具兹卧相”,“莹然光透,炯而无比”,以及清顺治十一年(1654)曾任顺德府知府的金之俊所撰《重修古邢州开元寺碑记》所说“石佛出于北阜”形成互证,既证实后赵襄国中寺被毁之后,确曾在北朝有过恢复发展;也证实了北朝两次灭佛事件对于佛教文物破坏之严重;还证实了今邢台开元寺的确处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型佛教文化遗址区内。世事沧桑,邢台开元寺的前身自西晋时即雄踞于城内,此后屡毁屡建,规模时大时小,而近些年新发现的这些佛教文物又都是在不经意间出土而非科学发掘。所以,开元寺地下的历代文化层中究竟还有多少北朝遗存,只能待将来科学发掘后方能知晓。

二

隋唐是佛教真正实现中国化并开宗立派的历史时期,而其首先在大一统的中国实现社会化,进而实现中国化的第一步,则取决于隋文帝的“我兴由佛”说,以及由此而在全中国兴起的造塔运动。据隋王劭所撰《舍利感应记》《续高僧传·昙迁传》及同书《宝袭传》等文献记载,自仁寿元年至四年(601—604),隋文帝先后三次诏令天下一百一十州,一准阿育王塔之式兴建舍利塔。邢州泛爱寺亦在其列,而奉敕礼送舍利到邢州泛爱寺,监督建塔供养者则是高僧宝袭。成化版《顺德府志》记载,泛爱寺在邢台城厢北部。《京畿金石考》著录,邢台有《文帝舍利塔碑》:“大业五年四月立,李百药撰,书人名缺不可辨。”

邢台城厢北部自东而西共有三寺,即开元寺、净土寺、天宁寺。其中,净土宗实由高僧善导开创于唐贞观十五年(641)之后,邢台净土寺既以“净土”为名,其创建时间自不会早于此时;邢台天宁寺唐初仅是一华池兰若,时至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才得赐额为寺。所以,坐落在城厢北部的邢州泛爱寺,最有可能就是两《唐书》《唐会要》所记,在天授元年(690)十二月被武则天选中,敕令改名为大云寺者;而这昙花一现的邢州大云寺,随即又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六月,被唐玄宗敕令改名为开元寺。换言之,隋文帝时的邢州泛爱寺、武则天时邢州大云寺,就是奉唐玄宗敕命再度改名,至今尚存的邢台开元寺。隋文帝选中邢州泛爱寺,是要在寺中敕建舍利塔,宣示“我兴由佛”;武则天改邢州泛爱寺为邢州大云寺,是要在寺中珍藏《大云经》,宣示自己“是弥勒下生,当代唐作阎浮提主”;唐玄宗改邢州大云寺为邢州开元寺,是要在寺中供养佛与自己的等身金铜铸像,敕命地方官员年年都到寺中为自己祝寿过千秋节。由此可知,此寺作为他们的御用大寺,在当年邢州辖域无可比拟的政治地位和宗教地位。

佛教真正实现中国化的主要标志,是其在中国佛教界的开宗立派。而最能体现其中国化之彻底者,则是中国禅宗的创立,尤其是自开元二十二年(734)始,经神会数十年的力争之后,以慧能为六祖的南宗禅法统的确立,即《传灯录》所说“天宝四年,方定两宗”。神会的这一历史功绩,就铭刻在分别由其邀请王维、宋鼎撰文,由蔡友邻、史惟则书丹的两通丰碑之上。这两通丰碑,就是《六祖能禅师碑》与《曹溪能大师碑》。

关于这两通唐碑,北宋欧阳棐《集古录目》记载:“能大师碑,兵部侍郎宋鼎撰,河南阳翟丞史惟则八分书。大师卢氏,南海新兴人,居新兴之曹溪。天宝七年,其弟子神会建碑于钜鹿郡之开元寺。”赵明诚《金石录》记载:“唐曹溪能大师碑,宋鼎撰,史惟则八分书。天宝十一载二月。”陈思《宝刻类编》记载:“史惟则(书)曹溪能大师碑,宋鼎撰,天宝十一载二月立邢。”同时记载:“蔡友

邻(书)曹溪能大师碑,邢州。”无名氏《宝刻丛编》记载:“曹溪能大师碑,蔡友邻书。”

《[光绪]邢台县志》在转载这些著录后,认为《金石录》所记“宋泉”为“宋鼎”之误,又自问自答了三个问题,其一,六祖慧能与其法嗣神会“皆无卓锡邢州事,不知何以于此立碑,又何以立碑于(慧能圆寂)四十余年之后?”其答案是:“盖神会为六祖法嗣,既于天宝四年分定顿、渐两教,再著《显宗记》以传世。又恐南宗之不行于北也,乃追述其师道德,刻石永久,欲以阐扬法教,指归宗派。”第二个问题是:“立碑之年,《金石录》及《宝刻类编》皆作天宝十一载,《集古录目》作天宝七载,未知孰是?”其答案是:“《金石录》《宝刻类编》两书既同,《金石录》又详书年月,殆《集古》误也。”第三个问题是,邢州究竟有无蔡友邻所书《曹溪能大师碑》?其答案是:“碑久佚,《宝刻丛编》《宝刻类编》与前碑(指史惟则所书同名碑)列为二,今姑存之。”这些答案扑朔迷离,孰对孰错?

现在,这一千年疑案已可大白于天下,即由王维撰文、蔡友邻书丹的《六祖能禅师碑》残石,由宋鼎撰文、史惟则书丹的《曹溪能大师碑》残石,均于邢台开元寺出土。前者树立于天宝七年,后者树立于天宝十一年。同时,今存邢台沙河漆泉寺遗址的《大唐广阳漆泉寺故觉禅师碑铭》,又对《集古录目》所记神会“建碑于钜鹿郡之开元寺”形成反证,使前述《邢台县志》所提“不知何以于此立碑,又何以立碑于四十余年之后”的问题,可以据之作出较为正确的答案。

据此碑记载,惠觉是由新罗入唐的求法僧,在漆泉寺栖居十年之后,取得邢州开元寺僧籍。天宝四年神会被宋鼎请到洛阳,弘扬南宗时,惠觉曾先后两次前往求教,并成为神会的嫡传弟子。神会圆寂后,惠觉步其使“曹溪了义大播于洛阳,菏泽顿门派流于天下”之后尘,开始于邢州“请导师之留音,追菏泽之坛教”,继续弘扬南宗,并取得了“如惊雷之震蠕介,春雨之泽根芽,种者乃萌,勾者遂直。七八年间,趋教之徒瞻拜(如缕)”的效果。所谓“坛教”,就是在所有中国高僧著述中,唯一可称为“经”的《六祖坛经》。据此推断,惠觉在邢州“请导师之留音,追菏泽之坛教”的最得意事,应即效仿乃师神会在洛阳菏泽寺为慧能立碑铭、建影堂之举,在开元寺树立《六祖能禅师碑》《曹溪能大师碑》,从而在使开元寺成为南宗北传之重镇的同时,自己也成了神会第二。或许正因为此,邢州刺史元谊才会在惠觉圆寂二十年后,亲自撰写《大唐广阳漆泉寺故觉禅师碑铭》,为这位异国高僧树立纪念碑。

邢台开元寺至今尚存的唐十六面《尊胜陀罗尼经幢》,曾因其独特的造型、奇妙的结构、精湛的工艺,引起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邢台开元寺外广场近些年出土的盛唐汉白玉佛教造像虽然皆曾遭到破坏,但仍不失由国富民强、歌舞升平孕育出的端庄严谨、雍容华贵的泱泱大国之风,可谓巧夺天工,让人叹为观止。邢台开元寺内新出土的《线刻经变故事图》,人物众多,情节丰富,场景多变,造型艺术精湛,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

原树于后梁乾化五年(915)的邢台开元寺《大佛顶随求尊胜陀罗尼经幢》精雕细镌,高达九层,在明代就曾引起大文豪归有光之关注,并使其发出“自晋宋以来,以至五季,佛教日盛,故虽兵戈微扰之际,其崇奉不一日废”之感慨;近现代又先后引起古建泰斗刘敦桢、北京大学考古系专家刘慧达的光顾,并将其作为古代工艺典范拍照摄影,通过自己的大作向国内外推介。至于因此幢剥泐而造成的所谓“空本译经”错案,本书已作《后梁大佛顶随求尊胜陀罗尼经幢初考》,试为引玉之举。当然,隋唐五代在邢台开元寺留下的文化积淀远不止这些,邢台开元寺在隋唐五代佛教史中的地位亦非这篇概述能说得清楚。

三

邢台人说:“唐修寺,宋修塔。”意即古邢台城内三大寺的宏伟规模,都是在唐代得以奠定的;

邢台城内外的佛塔、僧塔,都是在宋代达到登峰造极的。此说言之有据,确为信史。

其中,邢台开元寺塔林造型各异、林林总总的宋代僧塔虽于“文革”中被毁于一旦,其所附金石文物也已荡然无存,所幸仍有当年刘敦桢等先生留下的珍贵照片供人欣赏;邢台开元寺碑所记载只有洛阳阿育王塔、泗州澄观塔可与媲美的圆照塔至今亦无踪影,却有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敕赐邢州开元寺圆照塔记》、大定五年(1165)《大金邢州开元寺重修圆照塔记》,乃至至元十六年(1279)《顺德府大开元寺重建普门塔碑铭》三通丰碑文字完整地保留下来,使今人可以从其中认知这座高达六十仞,可容千余僧的九层玲珑宝塔(后由广恩重建为十三层)的巍峨壮丽,及其如何创建,如何在战火中被焚毁,又如何战后重新崛起的沧桑往事。同时可使今人得知,宋、金时期的邢州开元寺并非孤立,而是以开元寺为中心,以圆照塔为标志,由相对独立的文殊院、普贤院、弥勒院、石壁院等相拱卫,如同众星捧月一样的寺院群。

今存邢台开元寺的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铸大铁钟,高3.2米,下沿周长7.5米,重约9.1吨,外壁不但铸有钟铭“皇帝万岁,重臣千秋”、“香花供养,佛法僧宝”,以及日、月、人、兽、牛、鱼等为象征的黄道十二宫图和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图,还铸有题记十四组,分别记载监铸官员职务姓名、铸造年款、僧职法讳以及施主、铸工的姓名籍里等。此钟体积硕大、工艺精湛,虽经近千年沧桑而不锈不蚀,堪称现存金代所铸铁钟之王。

时至元代,由于以刘秉忠为首的邢州幕僚集团对忽必烈开创大元王朝具有不可比拟的历史贡献,且因曾经为僧的刘秉忠的大力推荐与提携,又形成了以万松行秀、万安广恩、虚照弘明为宗主的邢州高僧集团,遂使邢州即顺德府成为北中国的汉传佛教中心。邢台开元寺也因广恩被忽必烈敕赠“弘慈博大士”之号,其所创宗派被敕定为“大开元宗”,而得敕额“大开元寺”,从而进入其历史鼎盛期。所以,邢台开元寺流传至今的元代金石文物也最为丰富。其中,特为广恩树碑立传的就有关帝定宗皇后称制二年(1250)所立《邢州开元寺万安恩公塔铭》、至元十六年(1279)所立《顺德府重修大开元寺普门塔记铭》、大德五年(1301)所立《顺德府大开元寺万安恩公碑记》、后至元二年(1336)所立《顺德府大开元寺万安座下历代住持并垂法名颂之碑》等。

这些碑文不仅记载了广恩的弘法业绩及其被视为观音菩萨化身的缘由,乃至其生前死后由蒙元王朝所赐的种种殊荣;还记载了忽必烈经刘秉忠疏请,亲作顺德府大开元寺之大功德主,并在两幸该寺后,特允太子真金、太子妃阔阔真为该寺大护法,特遣近侍亲军为广恩护持建塔,“累降纶恩,优护瞻恤”的一系列史实。碑文还记载,为了突出顺德府大开元寺在汉传佛教界的中心地位,彰显大开元宗在汉传佛教界的特权,忽必烈不但敕准大开元宗可以自署宗摄、提点、僧录、判正、都纲等僧职,特命太傅刘秉忠、大丞相史天泽、宣政院使答失蛮以次提调;还应刘秉忠之请诏令天下僧尼,限期于至元十三年(1276)春三月赶到顺德府大开元寺资戒坛下,聆听国师杨琏真珈说法并受具足戒。据《大元顺德府大开元寺资戒坛碑》记载,这次资戒大会于当年三月初十启会,十二日由琏真国师登坛说法;“又有诸路推择大师德十人,递代登坛,与众授戒,自十日至十七日,满散凡七昼夜,受具足戒者十万余人”。可以断言,规模如此之大的资戒大法会,在中国佛教史上绝无第二例,堪称空前绝后之举。

众多的元代塔铭碑文还证明,终元一代,顺德府大开元寺的尊崇地位始终如一。大德五年所立《顺德府大开元寺万安恩公碑记》就记载,自广恩开创大开元宗始,大开元寺就由其“门人相机住持,克遵先范。自余从师有得,达性相根源者余五百人;绍续慧命,为人天眼者余百人;宠膺宝书,典司诸方及本宗者几半天下”。元成宗面对大开元宗僧团“几半天下”的无比之势,即位伊始就“敕答失蛮仍旧提调大开元一宗,直隶宣政院,释教都总统所毋得管领”,以示“三朝眷注之隆”。后至元二年(1336)所立《顺德府大开元寺万安座下历代住持并垂法名颂之碑》以万安广恩为祖师,共开列大开元宗传法嗣祖住持通慧崇润等十八代。通过开元寺塔林幸存至今的青石塔铭则可知,